

中国新闻业透视

——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

喻国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序 言

甘惜分

舆论学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人民在想什么？人民渴望什么？人民反对什么？人民喜欢什么？人民痛恨什么？这些不正是我们这些天天想着“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所急于了解的吗？舆论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在于了解民情。

研究舆论学有两条路子，一条是理论研究。研究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舆论的原始形态到现代社会极端错综复杂的舆论形态，研究舆论的形成及其扩展，研究舆论的运动规律，研究现代社会各阶级舆论的相互斗争，研究舆论的各种表达形式，研究国际间的舆论斗争，研究舆论与权力的结合所形成的巨大力量，研究民间舆论的威力，研究各种舆论手段的灵活运用等等，这是理论舆论学的任务。

另一条路子是从事实际的民意测验，这是从事理论舆论学研究的先行者，是舆论学的第一步，而且是很艰难的一步。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进行这项工作要冒不小的风险。它要紧随政治局势的发展，经济形势的消长，如果打起仗来，还要密切注意战局的进退，经常测量民心的趋向。这项工作既要进行分析，又要从定量分析中得出质的结论。它的结论可以受到一些人的热切关心，也可能引起另一些人的不快。它既可以测量人心的向背，也可以使政府了解政策的得失。在西方，它可能在竞选运动中推动一派上台执政，也可能把声名狼藉的执政者推下台来。它是政治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又是有关当局的一面镜子。正由于民

意测验具有如此重大作用，近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国逐渐流行开来，且有不断走向发达之势。

喻国明同志在上大学以前，当过兵，从事过不少社会工作，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最后又是博士生。他在三年博士生期间的研究方向就是民意调查。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它成立于1986年底，是我国第一个舆论研究机构）的主要成员，舆论研究所的多次重要的民意调查活动，喻国明都是主要参与者，又是调查报告的主要写作者。他在多次舆论调查的同时，研究西方民意测验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的博士论文《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就是他三年研究的总结，凝结了他几年的心血。

民意测验在中国是个新事物。按照古老的中国传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普通老百姓是不得干预国政的。尽管明亡之后的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似乎叫得更响，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制度、旧思想，仍然压得普通老百姓抬不起头来。新中国成立了，老百姓翻身了，人民大会堂里坐着不少工人农民的代表，但是传统的习惯势力仍然紧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总认为领导的意志比人民的头脑高明，有少数人（不是所有人）一听到民意测验就特别敏感，总以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鬼把戏。所以在中国搞民意测验常常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应该说，民意测验的具体内容是存在着倾向性的，主持人设计某一调查总是怀有某种主观意图。这是明显的，用不着隐讳的。但是，民意测验作为一种了解民情的形式，它又是没有阶级性的，即使调查的设计者怀有某种政治倾向，但被调查者都可以给你一个否定的回答，他可以在“不同意”栏内画上一个“√”符号。反之，你希望他回答“同意”的问题，被调查者却可以不予理会，表示不同意。这就是说，民意调查本身是中性的，它可

以得出不同性质的结论。也正由于这样，才能真正测量出民心的向背来。所以民意测验作为一种形式来说，应该是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的领导者都可以接受的。为了真正了解民情的变化，任何领导人都应该运用民意测验这种科学方法，我相信，民意测验在中国，也一定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长于逻辑分析是喻国明同志的调查报告的突出特点。民意测验的结果上了电子计算机，得到的无非是一堆堆的数字，要从这些千万个数据中得出一个鲜明的结论来，就非要从事具体的、细致的、反复的、交叉的分析不可，从定量分析才可以得出不同质的结论。经过喻国明同志的逻辑分析，它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无论是我们的政策的成功方面或不足方面，都在喻国明的笔下显示出来，它具有有一种震慑的力量。

喻国明的博士论文是专门研究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它是在几次民意测验调查的基础上的概括性研究成果。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你对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是赞成也好，是反对也罢，你都可以在喻国明的博士论文中寻求你所希望的或者不希望的答案。

中国新闻体制问题渊源久长，它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它的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要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从学术上进行一系列研究，为领导机构作决策的参考，总是有益的。学术研究者不同于决策者，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可以被采纳，也可以不被采纳，但只要研究者的态度是端正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么无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它总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各级领导者可以从一个认真的而非草率的、科学的而非故弄玄虚的学术研究者那里领会受到某些极为有用的东西。

目 录

引言：把握现实，思考未来·····	(1)
第一章 发展的失速与结构的偏态（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之一）·····	(8)
第一节 低水平上的失速：中国新闻事业的现实发展·····	(8)
第二节 分工度上的制约：中国新闻事业的一元结构·····	(15)
第三节 变革一元结构：面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	(19)
第二章 现行报道模式的陈旧与老化（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之二）·····	(23)
第一节 关于报道模式的一般理论·····	(23)
第二节 对党报现行报道模式的诊断·····	(29)
第三节 “党报模式”普遍存在的实证分析·····	(38)
第三章 “不变”与“万变”的碰撞（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之三）·····	(44)
第一节 一个实例：陈旧老化的报道模式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一次猛烈碰撞——关于我国新闻媒介学潮报道宣传效果的调查分析·····	(44)
第二节 以不变应万变：党报模式陈旧与老化的症结所在·····	(56)
第四章 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之四）·····	(78)
第一节 “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制的原则构想·····	(78)

第二节 一元多层的刚性控制：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基本特征及实践效应·····	(97)
第五章 变革中的新闻观念：对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改革问题抽样调查的研究分析报告（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之五） ·····	(121)
第一节 我国新闻队伍观念更新度的总体估计及其主要标志·····	(122)
第二节 新闻观念更新度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域·····	(131)
第三节 问题域探因：对造成新闻观念更新发展非稳态与不平衡的症结分析·····	(135)
第四节 关于推进和深化新闻改革实践与新闻观念更新的若干原则性建议·····	(138)
第六章 目标模式：选择与比较 ·····	(142)
第一节 关于新闻体制的多维性理论·····	(142)
第二节 新闻体制目标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150)
第三节 控而不死，活而有序：“ ■—■—■—■—■ ”目标体制概述·····	(159)
第七章 主攻方向：体制构造的变革与完善 ·····	(164)
第一节 构造微观基础的原则性思路·····	(164)
第二节 中介层次的构造：健全社会调控机体，完善社会调控机制·····	(169)
第三节 宏观控制机制的内容构成与正确运用·····	(178)
第四节 新闻体制改革的配套关系与时序安排·····	(183)
结束语·····	(188)
附录：改革开放大潮呼唤新闻改革——“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分析报告 ·····	(190)
后 记 ·····	(201)

引言：把握现实，思考未来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反思，有这么多的现实难题需要解决，有这么多的未来问题需要探索。如何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纳入社会主义高度现代化的轨道，是中华民族在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所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新闻事业作为现代社会通讯的主渠道，在社会发展与变革中历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的历史与实践均已表明，如果不把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变革放在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战略位置来认真对待，必将酿成历史性的重大失误。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强调要“抓好新闻改革”。①李瑞环同志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闻宣传所处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宣传报道的内容、手段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必须适应形势，进行深刻的改革。新闻改革如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样改的问题。”

②不言而喻，这里所谓的“深刻的改革”，当然不是写作技巧的改进意义上的改革，而是包括新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毋庸置疑，我们所主张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和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自我完善，这种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决不能用资产阶级的新闻观来对待新闻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新闻体制与模式。应该说，改革是时代和历史的大趋势，而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既能保持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独特优

①引自1990年3月2日《人民日报》

②引自1990年3月3日《人民日报》

势，弘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又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变化了的任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作为一名受党和人民培养教育多年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时代的召唤。

本文共分为七章、两大部分，以探讨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为主题而展开。如同任何改革一样，要进行新闻改革，必须回答这样四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现实动因是什么？第二，我们原来在哪里？传统体制的特征是什么？第三，我们将向何处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第四，我们怎样从起点到达目的地？这就是改革的宏观背景、起点模式、目标模式和过渡模式。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异常困难的课题。本文所试图做的，正是希望为上述问题的全部解决提供一点基础性的砖石。

第一章以论述我国新闻事业的“宏观发展和结构”为主要内容，从我国新闻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宏观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适应性的角度，论证了新闻改革的客观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第二章和第三章着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新闻媒介现行的“报道模式”，通过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内容结构和传播效果的客观考察，探究了我国新闻媒介在传播的行为与操作层次上所面临着的种种困扰和矛盾，表明中国新闻改革所面临的将是一场从外部约束到内部机制的系统性的改革。

第四章着重探讨“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原则构想，考察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现实实践，通过理想与现实之间某种反差的鲜明对照，使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乃至通过改革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

第五章主要对作为新闻改革中间层和行动层的新闻工作者的“主体状况”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分析，通过对其总体状况、改

革意向和现存问题的客观把握，将使我们对我国新闻改革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及可行性问题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深化。

第六章集中探讨了新闻体制的“多维性理论和模式比较”问题。文章从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客观可能性这一理论前提出发，对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三大基本选择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对比，论证了怎样做出选择才能真正做到“控而不死、活而有序”。

第七章重点讨论了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和着手处”的问题。文章认为，我国新闻改革的着眼点是改进机制、改善功能，着手处则是体制构造的改革和完善。为此，作者提出了有关改革的若干原则性建议，并对改革的步骤和时序安排进行了探讨。

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出并分析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新闻事业的现实运行所必然面临并需要解决的某些重大的基本问题。所谓基本问题，是指那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无法回避并会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那样一类问题。就作者的现实目的而言，主要有四：

（1）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新闻实践的结合，着眼于解决社会实践所提出的现实的紧迫问题。作者认为，面向实际，面向未来，完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向社会实践的过渡和飞跃，是使理论之树常青的唯一途径。诚然，由于我们所面临的情况的异常复杂性，由于新闻工作的发展变化受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的扰动，因此，关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未来，即使是最有权威的专家，也只能做出某种臆测。我们的唯一愿望是，希望它能够增强我们对可能实现的未来的把握能力，提高我们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的适应能力，多少起一点推动作用。

（2）致力于研究解决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的问题。社会主义

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规定。然而，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把加强党的领导与管理控制的刚性化简单地等同起来，以为党管的事情越多、越细，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就越有保证。建国以来的实践、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实践对此提出了大量反证，本文作者正是基于对这种状况的认识，尝试着探索出一条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新途径。

（3）致力于研究解决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弘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问题，以便使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在人民群众中更具吸引力和战斗力，更好地发挥党的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激励、鼓舞、动员、宣传群众的战斗作用。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从创建至今，走过了一条光荣而漫长的道路，其间积累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经验和传统，依靠这些经验和传统，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在革命和建设中曾经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伟大历史活剧。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新闻工作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有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正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在当前条件下弘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关键。

（4）探讨如何将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理想与现实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途径和可能性问题，以便在新闻传播领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毋庸讳言，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上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在事实上并未能够真正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践，以至使人对其优越性产生了诸多误解。我们认为，消除这些误解的真正有效办法，就是排除阻碍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优越性充分发挥的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不良因素，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原

则构想在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显然，探究阻碍这种优越性充分发挥的诸种社会原因，正是朝着这一方向作出实际努力的第一步。

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人们常常受到两种极端做法的影响，一种是从理论到理论自我完成，尽管其间常有天才的构想和发现，但其缺点是，它只能提出一个过于简单和一般的图景，以至于很难为决策提供依据、为实践提供指导；另一种是凭借大量的专门知识和实证材料分析某些特殊的和具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具体问题的具体方面得到了解析，但它却不能从总体和全局的意义上解决问题。本文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试图综合使用上述两种方法，以求我们的论点和论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际依托，为我们现实地把握今天，展望明天提供一种可靠的思路。具体地说，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有如下特点：

（1）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指导，同时也注意吸收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行文中对后者有所侧重。作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空白地带和薄弱环节的必要关注，正是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2）本文注重从社会实际和我国国情出发，注意实际地研究和解决新闻实践所提出的现实问题。作者认为，在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沿续了几十年的传统的新闻体制不改革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所主张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自我完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新闻事业更好地为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绝不是象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不但与我们改革的初衷不符，而且也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者坚持认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必须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它是一场有限度的改革，这个限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

说，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是有利于而不是有碍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贯彻。二，它是一场循序渐进的革命，所谓循序渐进，就是指任何改革方案或改革设想都不能急于求成，而只能是分步骤，分阶段完成的。因此，积极的探索精神和求实的科学态度是作者在写作本文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3）本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证色彩较浓，即特别注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意在使我们提出的判断持之有据。我们尤其看重自己亲身调查的十几项舆论研究成果，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本文思路的直接来源。自1986年以来，作者参加并主持的调查研究项目有：

- ①1986年1—2月 “经济改革宣传效果的调查”
- ②1986年7—8月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读者调查”
- ③1987年1—2月 “关于我国新闻媒介学潮报道宣传效果的调查”
- ④1987年7—8月 “政治体制改革与新闻宣传的调查”
- ⑤1987年8—10月 “边远地区科技队伍状况的调查”
- ⑥1987年10月—1988年10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听众调查”
- ⑦1987年8月—1988年2月 “全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发展状况的调查”
- ⑧1988年1—2月 “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
- ⑨1988年2—4月 “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改革问题的调查”
- ⑩1989年1—2月 “首都知名人士1989年展望的调查”

（4）本文选用事实和数据材料的原则是，确认其确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科学性。因为，在如此大的国家，面对如此丰富多采的社会现象，如果寻找一个缺乏代表性的案例来“论证”我们的主张绝非难事。同样地，寻找一个缺乏代表性的案例来“驳倒”我们也极容易。因此，我们的所有判断均着眼于事物的基本方面，而不应作绝对的理解。

(5) 本文侧重于对问题的揭示。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闻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完善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本文对现实问题的透视是为了能够廓清我们进一步前进的现实基础,看清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有哪些遗留下来仍需解决的问题,哪些是新产生而不可避免的问题。历史的沉积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约束条件,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在认识这些约束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由于某种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缺陷,在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保持社会稳定的要求之间常会出现某种不一致。这将使我们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协调和控制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深感到问题的真正解决,决非是三五部论著所能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它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换句话说,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做到既能克服现有体制的弱点又不失去现有体制的优点,并且能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期间需要做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本文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思考的基础。这既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最高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 发展的失速与结构的偏态

——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之一

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为了对今后新闻事业发展格局的可能前景进行分析，必须对我国新闻事业已有的发展水平及新闻传播的现实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判断。这不仅是理解我国新闻事业何以在经历了十年改革后的今天发生重大困难的关键，同时也是把握现实所面临的新选择的关键。

第一节 低水平上的失速：中国新闻事业的现实发展

在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新闻事业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新闻事业现代化的社会至多只能是一个瘸腿的现代化。因此，新闻事业的现代化历来被有识之士视为立国之本，而新闻事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指标就是其发育的程度和规模。

应该看到，我国新闻事业（台、港、澳新闻事业除外，下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间，其事业规模和传播覆盖面，已经有了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其中，报业的数量由1950年的382家、年总印数7.98亿发展到1986年的2151家，年总印数238.03亿份的水平^①。据1988年的一次全国受众抽样调查表明，在我国居民中，已有33.3%的人能经常读到报纸^②。而广播事业更是经历

^①1950年的数字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版），1986年的数字据《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

^②据《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听众调查研究分析报告》。

了由小到大，从无到有的巨大发展。1949年底，包括接管经过改造的旧中国留下的一批广播电台在内，全国共有49座广播电台（中央台1座，地方台48座）^①。至1986年底，我国广播事业已发展到拥有278座电台，播出370套节目的可观规模（对外广播除外）。电视广播则由1958年我国大陆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创办起步，在短短的二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为我国拥有受众最多的第一传播媒介。据统计，至1986年底，我国无线广播的混合人口覆盖率为70.2%，电视则达到71.2%^②。这一数字意味着，我国的广播电视已将七亿以上的人口置于自己的有效传播之下。这对于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如果我们不过份陶醉于这种绝对数的倍率增长所表现出的奇迹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倍率增长的奇迹是在一个基数很低的情况下发生。就总体而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现状还是低水平的。以发展速度最为惊人的广播电视为例，尽管人口覆盖率已经超过70%，但是拿国际通行的地域覆盖指标来计算，目前我国广播电视的有效地域覆盖率，据权威人士估算，大约在30~35%之间。换言之，在我国多达65~70%的广袤国土上，我们的电波十分微弱或根本就是空白。1987年8月至1988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关于《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状况》的调查证实，在大中城市居民分别收听、收看数套广播电视节目的同时，在我国“老、少、边、穷”的广大不发达农村地区有多达三亿之众的人口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信息极度蔽塞的封闭状态中。然而，由于这些地区基础薄弱、资金短缺、自然状况恶劣，要解决他们的听广播、看电视的问题，其困难程度要比解决前七亿居民看电视、听广播的问题大得多。事实上，问题的严重

^①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年卷）。

^②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7年卷）。

性还不仅仅在于发展的困难，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在这些地区甚至普遍存在着连原有的摊子都难以为继的窘况（调查中，不少地方的同志反映，国家每年下发的事业经费连他们的“吃饭”问题（职工工资）都解决不了。），表1—1便清楚地显示了作为不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主要收听工具的有线广播的严重衰退情况^①。

表1—1 我国不发达农村地区有线广播的下降情况

被调查县	原有喇叭入户率		现有喇叭入户率	
	年 份	入户率(%)	年 份	入户率(%)
岷 县 (甘)	1979	38.9	1987	2.4
渭 沅 (甘)	1976	96	1987	15
漳 县 (甘)	1976	98.6	1987	14
南 坪 (川)	1983	47	1987	40
若尔盖 (川)	1973	26	1987	2.8
罗 田 (鄂)	1977	75	1987	46.5
红 安 (鄂)	1983	56.4	1987	36
潢 川 (豫)	1973	69	1987	0.3
光 山 (豫)	1978	58.1	1987	15.1
新 县 (豫)	1984	80	1987	73
尉 氏 (豫)	1978	90	1987	90
涉 县 (冀)	1976	70	1987	96

^①参见《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报告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至于报业的发展，问题就更加明显。有关学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提供的七十年代中期的资料，以千人日报占有量为指标，将世界142个国家的报业发展水平分为“高”（390份以上）、“中等偏上”（50—390份）、“中等偏下”（1—50份）、“低”（1份以下）四个等级。即使拿这个七十年代中期的指标衡量，我国报业现有的发展水平也仍然属于“中等偏下”

（据1987年卷《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数字，1986年我国千人日报占有量为46.9份）。而如果按照1983年美国读者文摘年鉴所公布的统计数字排列，我国日报的千人占有量在该统计表所收入的158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第136位，与我们为伍的国家有：柬埔寨、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扎伊尔、苏丹等^①。而对新中国至今四十年我国报业发展的统计分析则表明，我国报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是反向的，即：在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的同时，报业的发展速度却在明显下降（见表1—2）。

表1—2 我国不同时期有关发展指标的平均增长率

年份 % 发展指标	1956~1965	1966~1975	1976~1985
报纸发行量	9.9	9.2	6.7
社会总产值	6.7	7.2	11.7
居民消费水平	2.9	2.4	8.4
城镇化水平	2.9	-0.4	7.0

资料来源：《关于我国报业发展的宏观定量分析》

^①参见《关于我国报业发展的宏观定量分析》（“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研究报告之六）附录四。